

# 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

姚建斌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875）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作为西方文学史上重要文学现象的乌托邦文学，尤其是乌托邦及反乌托邦小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为甚。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遮蔽了我们对西方文学史整体景观的了解与鉴赏，也阻隔了我们获得有价值的文学思想资源的可能性。作为研究存在的亚小说文类，乌托邦小说及反乌托邦小说能为我们走近存在，走近人自身的生存境遇，反思我们的文学观，进而重写文学史提供独特视角。

**关键词：**乌托邦 存在 乌托邦小说 人 生存境遇

向天空瞄准的人，  
比向树梢瞄准的人射得高得多。  
——乔治·赫伯特

1922年，当时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的美国学者乔·奥·赫茨勒教授在其享有盛名的《乌托邦思想史》的绪论中写道：

“似乎从来没有人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些乌托邦著述，就连学者对之也不甚重视。文学史将此视为怪诞作品或视之为属于政治学或治国术之类的东西而不屑一顾。政治学则认为乌托邦过于虚幻，也不科学，因而不大予以注意。宗教和神学界对其中少数问题研讨过，但乌托邦思想的大部分严格说来与宗教无干。于是，最后只好留待对人类有广泛兴趣的社会学从近代社会理想主义的角度，对乌托邦加以考察和评价了。”<sup>1</sup>

值得庆幸的是，赫茨勒在这种客观描述中所隐藏的对文学史鄙视乌托邦著述的批评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赫茨勒的时代以来，从文学的视角对乌托邦著述进行研究的学者和著作都一直在缓慢却顽强地增加。<sup>2</sup>即使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信息时代，

<sup>1</sup> [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4页。

<sup>2</sup> 国外从文学的视角来研究乌托邦的成果并不鲜见，现择其荦荦大者列举如下，以资参考。

Nicholas M. Williams, *Ideology and Utopia in the Poetry of William Blake*. Cambridge, U.K. ;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More's Utopia and the Utopian Inheritance*, edited by A.D. Cousins and Damian Grace.—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Christine Rees, *Utopian Imagination and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Pub. ,1996.

Paul G. Haschak, *Utopian/dystopian literature: a bibliography of literary criticism*.—The Scarecrow Press, Inc. Metuchen, N.J.,& London, 1994.

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lated by Anthony Nassar.—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 J. Brown, *Brave New world, 1984, and We: an essay on Anti-Utopia: (Zamyati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nn Arbor: Ardis, 1976.

Jean Pfaelzer, *The utopian novel in American, 1886-1896 : the politics of form*.—Pittsburgh, Pa.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4.

Edith W. Clowes, *Russian experimental fiction: resisting ideology after Utopia*.—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对乌托邦的关注也没有终结，最为有力的证据是，只要你向 google 这类搜索引擎键入“乌托邦文学”或“文学乌托邦”(utopian literature or literary utopia)这样的字眼，你至少会发现十万个以上的网页或网站在等待着你去访问。想一想，十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但是，总体而言，尤其是联系中外文学史，特别是西方小说史的实际来看，乌托邦文学(小说)直到今天都没有获得它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为甚。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遮蔽了我们对西方文学史整体景观的了解与鉴赏，也阻隔了我们获得有价值的文学思想资源的可能性。

## 一、被误读的乌托邦

长期以来，我们对“乌托邦”的解读其实是一种误读。如果要用一个字眼来概括这种误读，那就是，“乌托邦”一直被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被大多数人仅仅看作是理想社会，或者不可能存在的福地洞天的代名词。这种实体化误读的结果，赋予了人们头脑中不可胜数的美妙意向。如此一来，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体系中，“乌托邦”便以两种对立的身份出现：其一是指“积极的”、“向上的”、“催人奋进的”、“美好的”，在遥远的将来有可能实现的；其二是指“虚妄的”、“不真实的”、“荒谬的”、“空想的”、“白日梦式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出现的。可以说，自从人类遭遇“乌托邦”问题以来，这两种褒贬对立极其鲜明的极端性评判倾向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和人类的认识思想史。

自托马斯·莫尔提出他的“乌托邦”以来，它在随后的漫长历史中经过了转喻、隐喻、换喻的过程，从而与其词源学上的意义相去甚远。自莫尔以来，乌托邦思想经历了由实体而本体，由本体而存在的回归。尽管莫尔对他心目中的乌托邦进行了非常出色、引人遐想的描绘，但从本真的意义来看，与其说莫尔为我们勾画了一个美妙的未来社会制度的理想蓝图，不如说这种实体化的描绘与揭示遮蔽了乌托邦本有的光芒，使其本真变得晦暗不明，为后人探讨乌托邦之际，混淆“实体乌托邦”与“价值乌托邦”种下了最初的因子。

## 二、乌托邦与乌托邦文学

要想把这个问题说得比较明白、透彻，就不得不首先对“乌托邦”概念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做一些必要的了解与界定。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辞典的解释<sup>3</sup>：乌托邦是一种**理想**的国家，居民生活在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环境中。因此，“乌托邦的”和“乌托邦主义”被用来形容**空想的、不能实现的**改革。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T·莫尔以拉丁文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中(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1516)，“乌托邦”这一名称是由莫尔将希腊文“没有”(ou)和“地方”、“处所”(topos)两字组成的，意思是“乌有之乡”，或“不存在之地”。在英语中，乌托邦已经被当作理想的同义词，尤其是指理想的政府及社

<sup>3</sup> 参看：

- 1). 《简明布列颠百科全书》(第 8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5 月版，第 332 页；
- 2). Oxford Concise of Literary Terms, Chris Baldick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刁绍华主编：《外国文学大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8 页。
- 4). 《简明大英百科全书》(第 18 卷)，台湾中华书局印行，1989 年，第 475-6 页。
- 5). 《布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17 卷，1999 年，第 405-6 页。

会状况。因为这种理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乌托邦主义往往意味着不切实际与非现实的。

1515年，莫尔在法兰德斯大使任上写了《乌托邦》第二卷，描述了一个各种制度和政策完全受理性支配的、异教徒的共产主义城邦。描绘这样一个城邦的制度和尊严，目的是用来同基督教欧洲的非理性的政治制度作鲜明的对比。莫尔于1516年在英国写的《乌托邦》第一卷中，曾描写了这个基督教的欧洲怎样被各种私利和对权力与财富的贪欲弄得四分五裂。对乌托邦的描述，出自一位神秘的旅行家R·希斯拉德之口。他的论点是：共产主义是根治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利己主义的唯一良药。在对话中，莫尔支持一种观点，认为对邪恶只能缓解，不能根治，因为人的本性总是会犯错误的。因此，读者在读这部才华横溢的作品时需要猜测，究竟哪些地方是作者的严肃之谈，哪些地方是他故作反论。

乌托邦思想，即使在文学方面，在莫尔的著作问世之前很久就已经产生了。它出现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并在他的《理想国》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普卢塔克的《莱喀古斯传》中关于斯巴达的理想化描写也属于这一类乌托邦著作。类似的思想也见于中世纪的挪威、克尔特和阿拉伯的传说之中。

总之，从17世纪到19世纪，尤其是在法国，用关于乌托邦的作品批判现实制度是人们喜欢采用的一种惯有方法。当时出版了数百种这类著作。其中某些著作所表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现代极权主义的起源。除了出版著作之外，还有一些宗教团体和政治改革家尝试建立乌托邦公社，这种举措尤其见于美洲各地。

1663年，一些荷兰的诺派教徒在美国的特拉华河刘易斯地方建立了第一个公社移民区。1732年，德国的一些虔信派教徒在宾夕法尼亚建立了埃弗拉塔公社（Ephrata Community）。英国工厂主R·欧文于182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的“新和谐”公社，是最早的非宗教性质的公社之一，更确切地说，它是合作性质而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移民区。法国社会改革家C·傅立叶的思想对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改革家，尤其对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影响。从1841~1859年，在美国建立了大约28个傅立叶主义者的移民区。美国内战后，试办非宗教性质的乌托邦的热情开始减退。创建宗教乌托邦公社的尝试则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不过总的来讲，这些公社都是昙花一现，迅即消失。

而对于与乌托邦密切相关的“乌托邦文学”，一般认为指的是试图描绘人类社会最理想方式的纯理论作品。乌托邦的美好前景为改善人类环境提供了一种不容压抑的指望。乌托邦作家们对一些现代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已有所预料。成文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改良计划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或讽刺性的，也可能是推理性的。远在有乌托邦这个名字之前，这种想法就已经存在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典范。关于阿特拉提斯（阿特兰蒂斯）的传说产生（说激发也许更确切些）了许多乌托邦神话。清教主义产生了许多既是宗教性，又是世俗性的文学上的乌托邦。十九世纪是“盛行空想的年代”，“十九世纪充满了种种乌托邦书籍和设想，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十二年里，大约就有一百部乌托邦小说出现。”<sup>4</sup>许多乌托邦作品与其说是对现有的环境条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或途径，还不如说是讽刺或嘲笑它们。在此后的岁月中，甚至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乌托邦文学/小说作为一种亚文学现象或一种亚小说文类形成了一条几乎没有间断的传统。<sup>5</sup>20世纪，当计划中的社会

<sup>4</sup> [美]拉塞尔·雅格布 著 王雁翎 编译：《渴望乌托邦》，载《天涯》，2001年第2期，第40页。

<sup>5</sup> 一般而言，乌托邦文学主要是指乌托邦小说。尽管在其他的文类，如诗歌、散文之中也存在着乌托邦因子，但是中外文学研究者一般都不把诗歌、散文等视为乌托邦文学。而且，从中外既有的乌托邦文学研究成果来看，也基本上集中在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小说领域。为了论述方便，以下凡论及乌托邦小说，如非特别说明，就大体相当于对包括乌托邦小说在内的乌托邦文学的论述。此外，反乌托邦小说是在乌托邦小说

的可能性变得十分逼近时，就出现了许多热烈的反乌托邦或非乌托邦小说，在这方面，奥维尔的《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可为代表。此外，还有阿道斯·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纪》<sup>6</sup>、叶·扎米亚京的《我们》等。这些反乌托邦小说以文艺形式表达了对乌托邦的否定或不信任精神。

从以上的简要描述中，我们可以对乌托邦进行如下初步概括：

(1) 乌托邦的存在形式或者说表现方式有思想（观念）的、文学艺术的，以及理想社会制度远景规划的实体性的等三个层面；(2) 乌托邦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远在这个名字出现之前很早就已经存在了；(3) 差不多每一个过去时代中的思想家、哲学家，或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改革家，基督教（包括其他教派的）教徒，神学家等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乌托邦”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关注，换句话说，乌托邦与人类的文明史，尤其是思想史、文学史有着密切的联系；(4) 乌托邦的出现是以现存制度、既定秩序的堕落、邪恶、不完美、黑暗等为前提的；(5) 乌托邦就是作为现存制度、既定秩序的“他者”，一个批判性、否定性的他者而出场的；(6) 乌托邦与现存社会制度，或既定秩序的这种异在关系，尤其是对后者的批判、否定与讽刺，就使得乌托邦注定要同现实的政治层面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7) 由于乌托邦的批判性、否定性是建立于人们追求理想前途，追求完美无缺、自由自在的环境，和人本身的自由这样的心理基础之上，因而对现实的人具有激励、提升的积极功能；因此，(8) 那些以乌托邦的名义表达出来的思想，那些以乌托邦、反乌托邦，或者非乌托邦而现身的文学艺术，就具有明显的实践功能；(9) 乌托邦是以对现存制度和既定秩序的拒绝、批判、否定为前提，而对人类追求理想、美满、自由的精神冲动的审美形式的表述，有着明显的未来色彩，也就是说，乌托邦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一种完满的状态，都是一种“尚未”(not-yet)实现；(10) 乌托邦这个名词在托马斯·莫尔的笔下出现之初，并没有“贬义”或者“褒义”的区别；(11) 乌托邦最初是为了探讨对现有的环境条件，或面对社会现实矛盾、冲突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出现的，但它生来就具有相当浓厚的主观色彩、理想色彩，因此它所能提供的也只能是一种“想像性”、“象征性”，或者“虚拟性”的解决；(12) 乌托邦提供的想像性“解决”是以对现实社会和历史的敏锐洞察为前提的，它的意识形态指向不容置疑；(13) 乌托邦最初是以一个“肯定性”的形象进入思想者、文学家的视野中来的，它以对“现存”、“既定”的否定、拒斥来肯定了“将在”、“未来”，体现了否定与肯定的辩证法，或者说它既不是一味地否定，也不是一味地肯定，而是在否定之中包含着对肯定的期待，新的肯定的实现又内蕴着新的否定；(14) 对乌托邦进行“实体性”还是“精神性”的理解的分歧经历了一个先“实体”而后“精神”，再“实体”与“精神”不相区别的过程，这种其来有自的“实体”与“精神”两不分的历史，正是造成在乌托邦概念的使用上出现的混乱现象，以及由此而导致对乌托邦本身进行斥责的原因；(15) 由于自莫尔以来的一些乌托邦实践者，如欧文、傅立叶等人士系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们便自然地把“空想”、“白日梦”、“不可能”、“不切实际”、“幻想”等一大堆坏名声强加到乌托邦头上；于是，(16) 乌托邦常常充当了那些拒绝改革、害怕革命的保守人士的替罪羊，因为这些人

---

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亚小说文类，与乌托邦小说存在着学理上的逻辑关系，因而在下文的论述中，我们也会用乌托邦小说这一个概念同时指称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另有明确区分的除外。

<sup>6</sup> 赫胥黎的这部小说英文原名为 *A Brave New World*，得名于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一段台词，意味深长。在该剧第5幕第1场，从小生长在荒岛上，除了熟悉朝夕相处的父亲之外，没有见过其他人类成员的公主米兰达突然看见了一大群从海难中生还的人，不禁兴奋地大叫起来：“神奇啊，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美妙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对于这部小说的标题，至少还有三种中译，分别是：《美妙的新世界》、《勇敢的新世界》、《美丽新世界》。

往往会别有用心地利用他们作为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家”（拿破仑意义上的）优先地位，在社会上广为散布被强加诸乌托邦头上的那一大堆本来就值得怀疑的坏名声，乌托邦实质上成为了安于现状者的绝对挡箭牌。

总之，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乌托邦在历史的演变中获得丰富内涵的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了不小的麻烦<sup>7</sup>。在笔者看来，“乌托邦”这个概念的出现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似乎远较“理想”、“希望”等这些同等程度的概念更能启人遐想，并似乎远较这两个概念具有更多的理论兴奋点，似乎各式各样的人都能从“乌托邦”这儿化解出适合于自身理论背景的话语模式和言说方式。

### 三、存在与乌托邦

从上面的概括中，我们不妨对乌托邦作出这样的描述：乌托邦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的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简言之，乌托邦是对存在的研究与揭示。这样来看，乌托邦就主要不是指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毋宁是一种价值指向的目标。记住这种描述性界定，以及把“实体乌托邦”与“价值乌托邦”区分开来，将为我们进入下面的讨论扫清路障。

作为一种本体性的精神冲动，这种乌托邦冲动内在于每一个有正常心智的个人（主体）的生存结构之中；每一个特定时代的阶级（阶层、团体、集体），每一个民族都有着与自身历史、社会现实性相互动态制衡的乌托邦。没有乌托邦的个体或民族是不可想像的个体或民族。

人的生存、人类的存在，就是最大的乌托邦。自从人在宇宙中迈出第一步开始，乌托邦也就获得了与人同生共荣的法权。上古的神话、传说、祭祀礼仪、巫祝等等无一不可以看作乌托邦的初级载体。人对超自然的神力由顶礼膜拜到渴望征服的这种内心冲动，以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合乎人性，同时也合乎理性的原欲冲动。究其根本，这种乌托邦冲动乃是关乎人的存在的擎天柱。从这个意义上讲，乌托邦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存在主义哲学：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只要有人的存在，只要人还生存于这个宇宙中，这种乌托邦存在主义哲学就永远不会消失。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个体-主体，都附丽着乌托邦。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变革，个体-主体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乌托邦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如果要谈终极关怀，乌托邦才是最大的终极关怀；如果要谈存在主义哲学，乌托邦就是那最古老而又永远年轻，并且生动不已的存在主义哲学。人的历史，就是他追求自由、向往和谐、期待全面发展、渴望放飞自身丰富性的历史。这种追求、向往、期待、渴望，就是乌托邦释放自己的能量，承担自己的使命，发挥自身功能的历史。乌托邦慷慨无私地将自己整合到人类的历史、人自身的历史，以及文明史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中，整合的结果，乌托邦为自身获得了强大无比的威力，在精神宇宙中赢得了君王般的荣耀。但它似乎又很谦虚、谨慎，决不把自己变形为一个专制、残暴的昏君，它从不颐指气使地呵斥、愚弄它的臣民；它只是以自己最大的坦诚、最真的热情将自己整合于文明史之中。它从不奢求皇冠，但文明史早已明白无误地为它加冕。

乌托邦在外观上虽然已经消弥了感性色彩，似乎已跳出了“物质的纠缠”（马克思语），

<sup>7</sup> 对于“乌托邦”这个与西方思想史有着密切关系的概念的更详细的辨析，或者说正本清源工作，不是这篇文章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希望在别的场合可以进行这项工作。但我希望上文对乌托邦所作的简要回顾和辨析可以胜任解决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跳出了历史的视野，然而在对乌托邦的深刻剖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乌托邦对当下、对现实的超越，本质上是对一种最厚重的历史意识的追求，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历史意识的最生动的表征。这种厚重的历史意识追求，决定了乌托邦的开放结构，即是说，它永远处在将来完成时态之中，它是“尚未”（not-yet，恩·布洛赫语），它永远处在将来时态的对话期待之中。如果把这种期待比喻成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使这条河流奔腾起来的，便正是乌托邦内蕴的对话冲动——以“将在”反观“现在”，又经由“现在”而追问“既在”，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三维时空拉入一个敞开的对话框架之中。乌托邦时时刻刻昭示着现实的残缺、混乱、无序，警醒着人们不要忘记、更不要迷失了自我。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在人自身的成长历史之中，乌托邦总是担负着拯救灵魂、拯救历史、拯救理性的重大而深远的历史使命。在人的成长征途中，乌托邦像枪林弹雨中勇猛向前的旗手，像茫茫无涯、波涛如骤的大海中的灯塔，像气势磅礴、天然混成的乐队的指挥……它永远在指引，它永远在导航，它永远在照亮，它永远在召唤，它永远在前进！可以说，正是有了乌托邦的召唤、引导和激励，人类的历史，人自身的历史才会表现得如此丰富多彩、如此朝气蓬勃、如此律动不息。

乌托邦的生命与活力，恰恰在于它源自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升华冲动（欲望）之中。乌托邦随时随地把自己整合到现实世界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革之中去：大至宇宙的推演，小至朝菌的盛衰；大至社会形态的更替，小至惠蛄的嬗变，无不内蕴着乌托邦冲动。从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来看，从乌托邦思想史本身来考察，我们发现，在压迫最惨酷的时候，就是乌托邦冲动最为空前萌动的时刻；在黑暗最沉重的地方，就是乌托邦冲动注定要前往扫荡的场所。王尔德曾经说过：“世界地图如果没有包含一块乌托邦，它甚至不值一瞥；因为它缺少承载人性的地方。但如果人性在那里降临，它就会展望，并看到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人类的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sup>8</sup>尽管王尔德是从实体的角度而作出的这一著名论断，但其中对乌托邦精神的深刻肯定是显而易见的。

天主教神学家卡尔·拉纳在其神学人类学经典著作《圣言的倾听者》中分析人的认识活动的超前现象时指出，“超前”，即“先把握”，“是精神向着所有可能客体的绝对广延面所作的自我动态运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先验地随着人的本质的形成而产生的”。<sup>9</sup>按照这一思路，我认为，作为“尚未”，作为“将来之在”，乌托邦冲动所秉有的“超前”品性，恰正是精神向着所有可能客体的绝对广延面所作的自我动态运动的“能力”。就人的本质而言，他有义务去追寻乌托邦冲动的真理。人以自己的本质“营运”着一个开放结构，他必须聆听于乌托邦作为历史来临者所发出的启示。

乌托邦作为一种“将来在”或“超前在”的出场，无疑为人认识自己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为他的前提是，人在其有限性之中，或在其在者之在中，绝不可能完全占有或实现自己的丰富本质。这种几乎揭秘式的工作的过程必须使人认识到，人对接受“超前在”的启示与诱惑具有多大程度的开放性。<sup>10</sup>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对于可能光降的“超前在”的启示，即对乌托邦的肯定性的开放性，属于人的本质的构成要素，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之中的，而启示的内容却又不至于仅仅成为这种开放性以对象性方式来规定的相关概念，和它们所对应的抽象的经验世界。从而，我们有可能证明，超前在的启示，是可以真正倾听到的：它并不限于对人作形式

<sup>8</sup>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in *Selected Essays and Poems*(Penguin: London, 1954)P.34.

<sup>9</sup> [德]K·拉纳 著 J.B. 默茨 修订 朱雁冰 译：《圣言的倾听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1版，第65页。

<sup>10</sup> 参看[德]K·拉纳 著 J.B. 默茨 修订 朱雁冰 译：《圣言的倾听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1版，第26-7页。

上的，或者生物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庸俗唯物主义的肯定或否定，而实在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对人的本质予以肯定或否定。当这种肯定或否定在物质运动的实践活动中化为现实的历史推动力之时，就在终极的意义上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殊途同归了。

#### 四、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上）

既然人在其有限性——其在者之在——中不能完全占有其丰富的本质，既然人置身其间的现实生存境遇，或者说现状是残缺不全而且险恶的，他势必想方设法来接近乌托邦--超前在发出的启示与诱惑。在笔者看来，乌托邦小说是人谛听、探询乌托邦作为历史来临者的启示最常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因为乌托邦小说本身就是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形式而现身的。

在一次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中，米兰·昆德拉说过这样一段话：

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

11

这种看法如果谈不上特别深刻，至少是比较独特的，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极为接近小说艺术的本质。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我极为赞同昆德拉的上述看法，但也要对其稍作辨析。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昆德拉在对“存在”进行描述性界定时所用的“不……而是”、“并不是……是……”这种句式，以及“一切人……一切人”这样排斥性的字眼，在逻辑上给人强烈的全称判断印象，其语气的肯定与绝决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似乎免不了教条主义的嫌疑。再说，昆德拉对“存在”本身的理解也值得商榷。

其实，“存在”又何尝不包含“现实”这一维度（dimension）呢？毋宁说，“存在”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维交融汇通的立体全景图，排除、忽略其中任何一个维度，不仅会损害这个全景图的完整风貌，而且更加会损害人们对存在本身的理解。

不过，我们的重点既不在于探讨昆德拉对“存在”的界定，也不在于论述自己的存在哲学。就最基本的意义而言，存在就是人的生存境遇及生命本质的表达。笔者所感兴趣的是，如果把上引昆德拉的看法用于对“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小说”的研究，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众所周知，在小说这一大的文体种类下，如果按照不同的题材标准划分，它还包含了许多亚种，如推理小说、侦探小说、教育小说、科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哥特式小说、政治小说。<sup>12</sup>在笔者看来，在所有亚小说文类中，唯有乌托邦小说与反乌托邦小说最为关注存在。毋宁说乌托邦小说与反乌托邦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研究存在为其崇高使命。无论是就乌托邦小说来看，还是就反乌托邦小说来看，它们都是对“存在”这一“人的可能场所”的揭示、质询、探索，而这与我们上文对乌托邦所作的描述是内在一致的：乌托邦是内在于

<sup>11</sup>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2页。

<sup>12</sup>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现实——历史”、“创作风格”、“信仰”、“战争与和平”、“社会阶层”、“社会学”、“地理、地域学”等多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切入点对小说题材进行多侧面划分，从而相应地就有现实题材、历史题材、超现实（幻想）题材，悲剧题材、喜剧题材，宗教题材、僧侣题材、世俗题材，战争题材、好战题材、反战题材，宫廷生活题材、贵族生活题材、平民生活题材、农民题材、商人题材、军人题材，家庭题材、婚姻恋爱题材、社会题材、政治题材、教育题材、老年题材、青少年题材，城市题材、乡土题材、草原题材、丛林题材、海洋题材等区别。

人的生存结构中的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简言之，乌托邦是对存在的研究与揭示。在这里，“存在”作为人的场所既“不必实有其事，也不必实无其事”，而“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而在其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正是我们业已论及的乌托邦精神冲动。换句话说，无论是乌托邦所构想的至福洞天，美的、幸福、欢乐、丰富同在的极乐仙境，还是反乌托邦小说所想象、勾画的反人性、非理性、罪恶、黑暗、极权主义荟萃的反乌托邦世界，都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种亚小说文类所研究的存在都具有明显的预言性。

## 五、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下）

必须立即指出的事，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对“存在”的研究显然不同于哲学的沉思，即它们不是像哲学那样采取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题、从范畴到范畴、从体系到体系的抽象方式去思考存在，研究存在。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研究存在的基本路数可以这样概括：直面存在，揭示人在世界中的境况，挖掘“人与他的世界的可能”，用小说这种艺术手段来注解哲人海德格尔用“in-der—Welt--sein”（在世界中）所揭示的存在。这一路径，甚至是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得以成其为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的根本依托。换句话说，对存在的研究是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区别于其他亚小说文类的分水岭。

要理解这一判断，又是同领悟笔者在前文对乌托邦所作的描述密不可分的。前文已述，乌托邦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的，它毋宁就是人的存在世界的展开。因此，无论是乌托邦小说还是反乌托邦小说，它们各自所展开的艺术世界都是人的存在世界的展开，忽略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用小说对存在进行艺术性研究这一命题就是不完整的。

考察从乌托邦小说到反乌托邦小说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亚小说文类的运动轨迹内在地契合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运动：有一个正题，还必须为它给出一个反题，在正题、反题都已出场的情况下，还存在一个合题。这里所说的乌托邦小说，大致可以视为一个正题，而反乌托邦小说的出现，则不妨视为与其密切相关的反题。<sup>13</sup>这种思维方式，是与西方人擅长的分析、推理习惯密切相关的。<sup>14</sup>除此之外，现实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潮等“外在”语境的发展演变也从另一个方面作用于乌托邦小说向反乌托邦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

必须指出的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出现不是以消灭乌托邦小说为前提条件的，而且反乌托邦小说在问世之初根本没有内蕴这样的“野心”、企图。毋宁说反乌托邦小说的问世是为了完整地凸显西方思维方式在艺术世界的呈现，交锋、斗争，更是为了同乌托邦小说携手同心，把利用小说对存在进行研究这一神圣事业推向前进。如果仅仅有乌托邦小说，对存在的研究也许一开始能激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冲动。<sup>15</sup>但时间一长，人们便会把乌托邦小说所裹挟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指斥为肤浅、空洞、廉价、愚蠢、包藏祸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且，从深层来讲，一如上文所说，这也不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尽管置身后现代语境中的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乌托邦小说—反乌托邦小说发展轨迹指斥为二元主义的狂想曲，但是我们依旧不能不承认这种以二元思维结构为内在展开张力的狂想曲是生动、丰富、深刻，而且错

<sup>13</sup> 对于乌托邦小说的发展演变而言，是否有一个“合题”出现，以及这个“合题”何时出现，还有待于西方-世界小说文体的进一步发展。此外，社会历史文化思潮等宏观语境的变迁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sup>14</sup> 思维方式之于小说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远非一两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笔者在此仅仅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和研究方向揭示出来，以期引起同好的注意。

<sup>15</sup>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在问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被人们争相传阅，与此同时，还有一本接着一本的乌托邦小说陆续问世。具体可参看本文第五部分开列的重要乌托邦小说名单。

落有致、低昂互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如果抹去乌托邦小说与反乌托邦小说这两个住户，西方小说村落缩小的不只是其物理空间面积，而更重要的是其风景的质量、密度、深度，是其光芒、色彩与亮度。

小说家，按照昆德拉的理解，就是专事绘制“存在的图”的画家，他/她所承担的职责、使命似乎天然地高出一般的制图匠。因为一般的制图匠只要根据他人提供的测量、观察结果，按照一定的程式将其注入有特定模式的图表中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小说家，尤其是乌托邦小说家则要下潜到人的生存境况这一深不可测的海洋中，去发现、探查、标注其中的生物种类与群落、矿产资源的蕴藏及分布、海水的流向和温度，如此等等。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昆德拉的如下判断：

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sup>16</sup>

毫无疑问，昆德拉所说的小说家对存在的勘探，就是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勘探，是“对存在的清醒的审视”<sup>17</sup>。

那么，除了上面所说的基本路径之外，乌托邦小说究竟是如何来研究存在的呢？

在昆德拉看来，（乌托邦）“小说是通过想像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sup>18</sup>对于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艺术来讲，塑造具有鲜明生动性格的人物形象是题中应有之义。<sup>19</sup>这一点，对于我们在此探讨的乌托邦小说而言没有例外。但是，比较而言，乌托邦小说作者并不是特别看重对人物的塑造，对他们而言，人物毋宁是表达其政治主张、社会改革方案、教育观、财富观、生死观、阶级观等的工具或传声筒。显然，乌托邦小说的作者并不讳言其笔下人物的工具色彩。恰恰相反，乌托邦小说的作者总是尽可能地通过笔下的人物来宣扬、声明自己的主张。

就以托马斯·莫尔笔下的希斯拉德为例。据研究，希斯拉德这一名字是用希腊语构成，大意可能是“空谈的见闻家”<sup>20</sup>。作者这样描绘他的外貌：“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儿，面孔晒得黝黑，胡须颇长，一件斗篷不介意地披在他的肩上”，他的外貌和衣着让人觉得好像一个船长。此外，作者还告诉我们，希斯拉德“不但精通拉丁文，而且深晓希腊文”，“他对希腊文下的工夫比对拉丁文还要深些，因为他竭尽全力去搞哲学”，他不羡慕金钱和权势，宽宏而真正富于哲理的气概。除此之外，作者并没有花费更多的笔墨对其笔下人物性格、外贸、服饰等有更多、更详细的描绘，他所关心的是怎样通过自己的人物实现自己的意图：1）、通过人物口对现状提出批评。在《乌托邦》的第一部，代表作者观点的旅行家希斯拉德尖锐地抨击了当时在英国已登峰造极的君主专制制度，他谴责君主们贪图私利，百般聚敛，巧取豪夺，严刑酷法，杀人如麻，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无情剥削，大批贵族的存在是当时社会突出的首要的和根本的祸害，揭露深刻全面，语气坚决而直率。而最有名的是描写了“羊吃人”的事件——英国农民在养羊业发展的影响下怎样被剥夺了土地——这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从几乎开玩笑似的指责开始，作者借助西斯拉德之口“对农民丧失土地的

<sup>16</sup>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3页。

<sup>17</sup>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78页。

<sup>18</sup>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80页。

<sup>19</sup> 尽管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小说出现了淡化情节、淡化人物形象、淡化伦理道德评价的倾向，但是对于人物形象的淡化处理毕竟不等于取消人物形象。

<sup>20</sup> 参看[英]托马斯·莫尔著：《乌托邦》戴榴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二版，第3页注释②。

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及其深刻而细致的充满忿怒的分析”<sup>21</sup>。整个描绘极其逼真，在深深打动读者的同时也催人深思。2)、探讨改良社会制度、消除现实缺陷的措施。在乌托邦作品如《乌托邦》中，不仅仅展示了当时社会制度的个别缺点，对其进行了深刻分析，而且还探讨了消除这些缺点的局部措施。3)、通过笔下人物的游历或探险等活动，描绘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在《乌托邦》的第二部中，作者在总结对英国社会制度批评的基础上，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制的理想社会制度：财产公有；除极少数人外，人人都须参加增进国家财富、提高社会福利、有益于改进全体人民衣食住行诸种生活状况的劳动；乌托邦人牢牢地树立了务农为本的观念，特别重视农业劳动；乌托邦人对城市规划相当重视；卫生健康也是他们考虑的大事；国民教育和学术研究在乌托邦占有重要地位；在乌托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理性化的宗教。

就莫尔所处的时代而言，他的这些见解在社会政治思想层面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进步意义，“莫尔的伟大功绩，就是他在贫苦农村的不满情绪的影响下，能够运用他那人文学科的学识，制定出一种比无产阶级化的农民本身的社会觉悟水平高得无可比拟的社会方案。”<sup>22</sup>莫尔借助转述笔下人物旅行见闻的准游记手法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用文学的手段、对话体的方式来讨论改良现状的社会方案，使原本可能枯燥、乏味的行文变得生动、活泼，读来能给人深刻印象。

除了对笔下人物的工具性利用之外，反讽是乌托邦小说最常见最主要的艺术手法。在不同的乌托邦小说中，反讽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在有的作品中，如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小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伯吉斯的《发条橙》等，<sup>23</sup>反讽是它们的基调。在这些作品中，作为其基调的反讽格外浓烈，不是一般的夸张、变形或扭曲，而是整体的颠倒、错位：鲜活的人成为机器、号码、符号的集合体，生命可以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按照设定的条件成批量地生产，犯罪被视为游戏，而爱情却被颠倒为罪恶，异性之间的关系仅仅限于肉体的接触，拥有父亲母亲被视为不知羞耻的野蛮人标志，人成为下流卑鄙的“野胡”，“慧骃”则是现实社会的人类应该学习的榜样……这种整体的颠倒、错位带给人们辛辣深刻的讽刺、冷峻严厉的批判，震撼灵魂的冲击力，读后甚至让人产生不祥的恐怖感。正是在这样的阅读效果中，乌托邦小说的反讽力量凸显出来，而作者通过其所营构的“反常”、“不存在”的艺术世界唤起现制度中人反省其存在、生存境遇的意旨也水到渠成地流泻其间。而在有些作品中，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帕特里奇的《幸福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烈亚的《基督城》、培根的《新大西岛》、费奈隆的《泰雷马克历险记》、梅尔锡的《2440年可能实现的梦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C. 佩金斯·吉尔曼的《女儿国》、法朗士的《在白石上》、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等，其间的讽刺尽管常见，但尚不足已构成作品自身的基本色调，夸张的手段，寓言的笔法，幽默的笔调，抒情的氛围，叙事的手法，睿智的议论等等也随处可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反讽最重要目的就是，让现制度中的人反省其作为人的存在、生存境遇，对现状中的缺点予以抨击、改进，对可能来临的恶果保持高度警惕，对人类自身、人性的弱点给予批判，反抗人自身的退化。

当然，作为以研究存在为其要务的乌托邦小说，其艺术特色远不止如上所说，其他如超乎寻常的“想象”，语言表现上较多地运用“双关”、“谐音”、正话反说等也值得深入研究。

<sup>21</sup> 维·彼·沃尔金：《〈乌托邦〉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载托马斯·莫尔著：《乌托邦》，中译本，第138页，版本同上。

<sup>22</sup> 同上，第148页。

<sup>23</sup> 关于扎米亚京的《我们》中“反讽”的地位和作用，请参见顾亚玲为该书中译本所写的“译后记”，见《我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351页。

再比如，对乌托邦小说与希腊后期的游记体裁小说之关系的探讨，也是不能忽视的课题。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只能另文讨论。

#### 余论：乌托邦小说，一个亟待研究的亚小说文类

如前所述，就西方而言，即使仅仅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在欧美主要国家，如英、法、奥、美等，形成了一条几乎不曾中断的乌托邦文学传统。全部梳理这一乌托邦文学传统显然会使本文偏离其主旨，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列举这一文学传统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多尼的《世界》(1552)、帕特里奇的《幸福城》(1553)、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02)、“I.D.M.”的《天使之前》(1616)、安德烈亚的《基督城》(1619)、培根的《新大西岛》(1627)、戈特的《新圣城六卷》(1648)、温斯坦莱的《自由法》(1652)、哈林顿的《大洋国》(1656)、加布里埃·德·富瓦尼的《驰名南国》(1676)、费奈隆的《泰雷马克历险记》(1699)、梅尔锡的《2440年可能实现的梦想》(1770；英译本1772)、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sup>24</sup>、埃利斯的《新不列颠》(1820)、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1840)、布尔沃—利顿的《竞赛将临》(1871)、勃特勒《埃瑞洪》(1872)、凡尔纳的《神秘岛》(1875)、格伦隆德的《合作社共和国》(1884)、贝拉米的《回顾：2000年—1887年》(1888)、赫尔茨克的《自由国》(1890；英译本1894)、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1)、豪威尔斯的《阿尔特鲁利亚的来客》(1894)和《穿过针眼》(1907)两部曲、左拉的《四福音书》(1899-1903)、C. 佩金斯·吉尔曼的《女儿国》(1900)、法朗士的《在白石上》(1905)、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1905)、杰克·伦敦的《铁蹄》(1907)、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1920)、芒福德的《乌托邦的故事》(1922)、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威尔斯的《帕尔海姆先生的独裁》(1930)、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1932)、辛·刘易斯的《这在我们这里不可能》(1935)、恰佩克的《鲑鱼之乱》(1936)、奥威尔的《动物农庄》(1945)和《1984》(1948)、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1962)、费·威尔顿的《达尔茜的乌托邦》(1990)。

25

与西方乌托邦文学漫长的发展实际状况相比，这里所开列的乌托邦作品及其作家显然是不完整的，至于那些被公认为包含有乌托邦成分的作品，如拉伯雷的《巨人传》、莎士比亚的童话剧《暴风雨》、雪莱的《麦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拜伦的《岛》、乔治·桑的《安多亚纳先生的犯罪》、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麦尔维尔的《马狄》，甚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等，暂时也没有列入正文的名单中。即使那些已被列入名单中的作品，对于它们是否都能称作乌托邦文学，研究者之间也存在分歧。但是，就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而言，这一长串名单足以证明我们此前所作的断言：至晚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在欧美主要国家，如英、法、美等，形成了一条几乎不曾中断的乌托邦文学传统。<sup>26</sup>

<sup>24</sup> 一般认为，乔纳森·斯威夫特所著《格列佛游记》的第四卷“慧骃国游记”最具备乌托邦小说的艺术特征，“慧骃国”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乌托邦。这一点有些类似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对“君子国”的处理。

<sup>25</sup> 关于这些不同分歧，可参见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Philip Allan, 1990.

<sup>26</sup> 对于西方乌托邦文学的起源和萌芽，一般研究者都追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也许主要是因为柏拉图在西方文化世界影响过于强大的缘故。事实上，这种理解是比较狭隘的。因为在希腊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在另一个民族和另一种著述种，有一些人——希伯来先知者——就提出过不少乌托邦思想。参见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第8页以下，版本同注释1。

但是，对于这样一条重要的文学发展线索，学者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在不少研究者的内心，一直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乌托邦文学根本不能也不必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至多可以当作白日梦者的呓语。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外国文学中更是特别明显：通行的几种“外国文学史”或“欧美文学史”教材甚少专门讨论我们在此列出的那些乌托邦小说，仅有的一些论述也大多肤浅、零散，更没有表现出从文类学角度从事乌托邦小说研究的意识。如果听任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我想，我们对西方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的了解必然会受到局限。而这种文学史认识上的局限，也会妨碍我们对西方文化特质的深入了解。

本文的研究至少表明：乌托邦小说这种亚小说文类的诞生，使人类用小说研究存在的视角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使人们对人与他的世界的感知、认识、理解、把握得到了空前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乌托邦小说的诞生刺激和推动了现代小说的诞生。联系西方，尤其是欧洲四个多世纪的小说发展历程来看，这个判断的合理性似乎尤其明显。而在乌托邦小说问世之后的反乌托邦小说则把人类用小说研究存在的水平再次向前推进了一步。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门类，乌托邦小说及反乌托邦小说能为我们走近存在，走近人自身的生存境遇，反思我们的文学观，进而重写文学史提供了独特视角。

对于乌托邦小说这样一种与小说艺术，与人的存在有着如此密切关系的亚小说文类，无论如何也不能随便打发掉。仅仅凝视本文开列的名单，谁还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对乌托邦小说视而不见？！